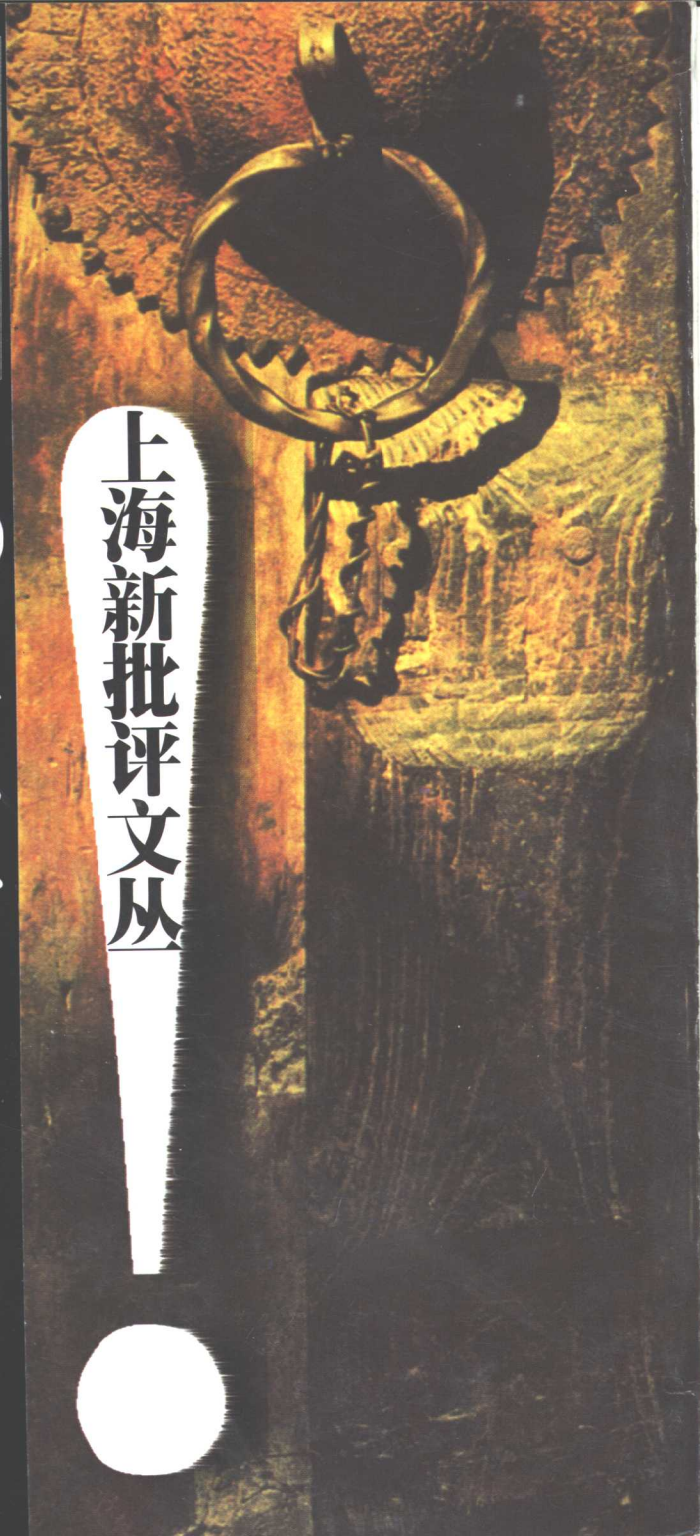




郜元宝

另一种权力

上海新批评文丛



上海新批评文丛

策划：叶觉林

另一种权力

郜元宝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种权力/郜元宝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上海新批评文丛)

- ISBN 7-80673-066-4

I. 另... II. 郜...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596号

丛 书 名: 上海新批评文丛

书 名: 另一种权力

著 者: 郜元宝

策 划: 叶觉林

责任编辑: 侯福河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上海·点石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7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字 数: 209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73-066-4/1·040

定 价: 1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经济学“来了”	(1)
不说“知识分子”	(8)
居韩零墨	(12)
做一回看客何妨?	(19)
风筝	(23)
另一种权力	
——荧屏明星传记批判	
.....	(30)
影视十怕	(52)
“可以可笑可怪目之……”	
——“怀旧”电影的本质	
.....	(56)
吝啬的镜头	(60)
余华的苦难意识	(63)
张炜的愤激、退却与困境	
——评《柏慧》	(76)
新旧精粗杂谈	
——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及其他	



.....	(82)
豪语微吟各识帜	
——漫议 1995 年的几部长篇小说.....	(85)
水和泥总要做成一块	
——我看“女性写作”.....	(96)
“留学生文学”漫议.....	(99)
“知青文学”一瞥.....	(102)
九十年代都市小说.....	(109)
荒芜的悸动	
——谈谈卫慧的小说.....	(113)
阎连科的“世界”.....	(119)
在“断裂”作家“没意思的故事”背后.....	(136)
我的批评观.....	(143)
开放社会的文学批评.....	(146)
在新的“名教”和“文字游戏”中穿行	
——文化论争的一份个人备忘录.....	(149)
产生文学批评的条件.....	(165)
尚未完成的“现代”	
——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170)
文史即心史	
——关于新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192)
“大音希声”和“寂静的轰鸣”	
——寻求东西方语言哲学对话与沟通的可能性道路	
.....	(208)
“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	
——海德格尔论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关系.....	(232)

重写中文

——《王蒙小说语言论》序..... (243)

后 记..... (251)

经济学“来了”

要说现在文人可好过多了，例如随便挨整的机会就渐渐稀少，尽管厉害的棍子还很有几条。这是值得庆幸的，虽然也并不保证人人都可获此幸运。

然而很快就得忍受另一种烦恼：来自同行中先进人士的奚落。还是那句老话，“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学，或广义的文章，非但不能治国安邦，自身问题也常常闹不清楚，不得不请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之类相帮，其被奚落、遭挖苦，也是理所当然。

最近帮助或者奚落文学的就有经济学，但并非本来的经济学，而是文学专业中先进人士的速成经济学。先进人士之所以先进，就因为他们作为文学研究者，学有余力，啃了几本经济学著作，找到一切问题的总根，批大隙，导大窾，恢恢乎游刃有余，文章都带有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气派，理论推演势如破竹，旁征博引证据充足，体系宏大并流贯着诗的激情，分析冷静又洋溢着人文关怀，一门最具声势的学科遂宣告成立。它的名字很动听：人文经济学。治此经济学的



人，可谓之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或受了经济学训练的人文主义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曲终奏雅、繁荣昌盛的局面大概很快就要到来或者已经来到了罢。

道理已经很明白，经济问题压倒一切。国内和国际知识分子或普通老百姓，大家关心的都是“怎样把经济搞上去”，因此解释当代社会，经济学必须具有其他任何学问所没有的权威性。开口不谈经济，不仅说明你在“知识谱系”上脱离当代社会，也暴露了你精神情感的冷漠，因为你竟然不关心“人民”普遍而迫切关心的问题。经济问题使知识分子和政治意识形态在曾经冷寂的人民话语上空前地契合，新经济学的权威也由此而剧增。不懂经济学，就是对一本小说，最好也免开尊口，因为分析到最后，任何小说的终极关怀只能是经济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明乎此，欲从文学中挖掘经济以外的微言大义者，便是呆瓜，而用糟蹋文学的笔杆子纵论经济学，即使掂拾旧谈，煞有介事地考证“经济”一词的由来，也都算是聪明人。

但经济学家在可怜“文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太微弱了”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给被可怜者一点安慰：“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文学一度散发的魅力，一度具有的功能，如今尽为新经济学所囊括。在新经济学词典里，文学就只有“文笔”还可以发挥剩余价值了。

当代社会已经化约为纯粹经济学对象了吗？人已经化约为纯粹经济动物了吗？要这样，文学确实可以无言。这样的现实，这样的人，文学确实解释不了，也无须文学来解释。但解释纯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何必冠以“人文”二字呢？依我的愚见，“人文”并不等于“文笔”，“人文经济学”也绝不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吧？难道当代社会并未化约为纯经济现象，人也并未化约为经济动物，因此新经济学暂时还不能包打天下，必须拉上“人文”什么的做伴？果如是，则新经济学又并非新经济学家吹嘘的那般高深莫测，它或许还相当通俗，相当容易亲近呢。

好像情况也确实如此。比如我最近怀着十分的敬畏，看了这方面的几篇文章，就发现三件可以证实上述猜测的趣事。

一是我过去以为只有没出息的文人才闭着眼睛写随笔，现在知道了，新经济学家也喜欢一本接一本不停地出版一种叫做“人文经济学随笔”的东西，确实不摆什么架子，“文笔”也清新流畅，不时还有感觉的迸流、真情的火花，“实在标致极了”。

二是新经济学有点像拔河，比如刺激内需以“拉动”生产啦，还有怎样怎样就“拉动”什么什么啦。最近权威人士又在大声疾呼“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亟待挖掘”！妙。城里公款吃喝公费嫖娼之类果真被制止，市场营销的战略眼光确实应该转向“广大农村”。十亿农民啊，一人买一把牙刷，要开多少牙刷工厂？一人买一条裤子，要开多少服装厂？推而广之，一人买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块手表，再适当收点消费税，那将是怎样一个数字？倒闭的小厂不用说了，就是国营大中型企业也都能够“拉动”，成千上万下岗工人也都能够拉回来。多美妙的前景，然而又如此简单，怎么以前就没想到呢？所以应该承认，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通过一种力学的图解，确实进步了不少。

三是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原来由蛋糕引起。据说现在主要存在“效率和公平之争”，双方面红耳赤，结果都端出杀手锏，就是各自准备好的蛋糕：“公平”派说目前经济问题主要是分蛋糕时，有人多拿，有人少拿，有人没的拿，于是产生了矛盾，阻碍了经济发展。“效率”派说问题并不在此，而在蛋糕太小，蛋糕做大了，人人都有得拿，再做大些，原来没的拿的人拿到手的那份，可能比蛋糕太小时拿得最多的人拿到手的那份还要多，所以公平问题最终要靠效率来解决。不知两派争论的结果怎样，只是这一阵子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恍若就是口吐白沫高谈阔论的新经济学家了。

新经济学，或人文经济学，亦即速成经济学，或蛋糕经济学，可以用随笔形式撰述，配有浅显的图解，很形象，很生动，也就

是很“文学”。

新经济学既奚落文学，又悄悄从后门把文学请回来，其所取于文学者，盖不止于“文笔漂亮”也。它实在就是文学的一个变种，但做了变种手术后，失去的只是文学在今日社会惨遭奚落的地位，获得的却是领袖学界，类似文学曾经拥有的那种一呼百应的声势。这种变种手术在文学领域也确实屡见不鲜，上述考证“经济”的词源而急于和新经济学攀亲的就是。这在新经济学方面，是俯下来，在文学方面，是迎上去，宜其相拥相抱之速也。

俯下来，迎上去，目的地都并非对方，而是那根晃动不已的中间线：形势的需要。

过去二十年，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某种配合当前形势的文化样式或学术趋向炫耀于一时。形势每个阶段都不相同，文化界也就相应地呈现出阶段式推进。一会儿文学高潮来了，不仅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现在则是集体疲软，人人可得而奚落之。一会儿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来了，什么都必须纳入后学分析模式，有敢于质疑者马上就要被当众讥晒。无奈去年一场大水，后学与反后学的声音被同时淹没，令人觉得学说也像王八蛋工程一样害怕大水。一会儿是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理论来了，但听说洋人萨缪尔·亨廷顿也有类似说法，甚有碍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于是群起而攻之，据说还特地出了一本讨论专集，自己先前类似的理论自然也就趁人不备，悄悄藏了起来。如此虎头蛇尾，不知是否得了反腐真传，比如都快问成死罪了，公布出来却只是两块手表，几元美钞。或者究竟也只好模糊过去的吧。现在轮到速成经济学来了，然而它除了面红耳赤地端出蛋糕，接二连三地印刷随笔，就是以震动耳目的社会新闻代替无法获取的精确统计，以学习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读书笔记代替针对自己经济现实的理论探索，甚至不惜用备受自己奚落的文学来修饰羽毛，“吸引更多的读者”。

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繁荣本不是一回事。现在坊间大行哈耶克

的书，但哈氏在世，英国经济明显衰落了，而亚洲四小龙却未闻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这倒不是说经济 and 经济学毫无关系。关系肯定是有的，但绝对不是抱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想头，为着应时而速成的经济学一厢情愿地要和经济攀上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说经济学就不能以随笔出之，更不是说经济学不该有人文关怀。不是的。经济学一开始就关心国计民生，一开始就和整个人文传统（自然也包括随笔）紧紧相连，但这个“人文”，倘要跟那个将文学理解为“文笔漂亮”的人文经济学的“人文”沟通起来，大概很难吧。

近代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先是从文化本位立场俯就西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文”是内家心法，“师夷之长技”则为外家横练。后来发现不行，遂激变为强调改造自己的本位文化，强调文化改造是本，船坚炮利乃至政治经济体制是末。梁启超著《新民说》，大声疾呼倘不以道德建设为本，“恐今后智育愈盛而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民且相率而为禽兽也。”降至“五四”，则有陈独秀所谓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说”。梁陈之道德伦理各有所指，注重“人文”则无差别。这种共识确实深深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人说现代中国盛行道德主义以及和道德主义紧相连属的文学主义，也不为无稽之谈。问题在于，看重道德和文学而且把它们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是否意味着道德和文学真的就来了，“我欲仁斯仁至矣”，甚至道德和文学真的就过剩了，真的就压抑了其他学问的生长？道德主义和文学主义盛行的现代，道德虚无和文学滑离本位的现象不是始终存在着吗？像鲁迅那样名副其实道德高尚文采斐然的有几个？而且“五四”或近代人物强调道德文学的重要性，是否就逻辑地包含了压抑道德文学之外其他部门的意向？两方面难道也像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国人经济思想或体制意识之不发达，是否就得算在“五四”的账上？“五四”道德主义或文学主义（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是铁板一块的吗？这些问题并没有弄清楚，现在就又变化

到惟“实学”(科技经济之类)是崇,宣传叫嚷犹嫌不足,还要反过来批评以往过于注重道德文学之误,一些海外学者(如林毓生先生)甚至认定自己预先塞给“五四”的所谓“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受了“儒家思想模式(即儒家传统中强调‘心’的理智与道德功能的社会历史整体观)的影响所致”,应予否定自然不成问题。这和前两年以为大叫几声“道德理想主义”就可以集道德理想于一身的文坛慷慨党,在“思想模式”上相隔也只是一纸张,即都是受了早就被“五四”一辈人深刻批判过的同样属于中国传统的“名教”的“影响所致”,不肯“循名责实”,习惯于听到什么东西叫得响,就以为什么东西一定已经“来了”,而如果这“来了”的东西仍然不能“从整体上改造社会”,就马上加以种种溢号,宣布无效,又转过身来,呼唤或等待新的救世法宝的到来。似这般身中“名教”剧毒而吠影吠声的“思想模式”,必然会“扶东倒西”(梁启超语),刚刚有所肯定,旋即又加以否定,如此反复,结果什么也没肯定,什么也没否定,只有一些用于攻击对方或用于肯定自己因而似乎在否定什么又似乎在肯定什么的精致的溢号,也就是“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学”之类,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永远不会穷尽。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伊凡和德米特里就当时俄国社会思想状况发生了争执,一个主张以欧洲蒸蒸日上的自然科学衡量一切,包括上帝的信仰;一个并无定见,却看准了对方的偏执,施以辛辣的讽刺,说他的想法无非“化学来了,诸位请挪挪位!”我们这里的速成经济学家们激动地宣布经济学时代来了,一切都将重新开始,都将接受经济分析的检验,其声态形容,与这位化学决定论者颇相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啻给所有断定自己的理论杠杆能够撬起地球的人画了一幅标准像。

也有不同。以化学为终极真理的那个小卡拉马佐夫确实让自己的化学和“诸位”激烈而痛苦地交战了,我们这里的新经济学却和刚刚还被自己奚落的文学迅速抱在一起。崇拜化学的人所以崇

拜化学，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化学能够解释一切，但崇拜经济学的人所以崇拜经济学，并不说明他确实相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相信诸如“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亟待挖掘”之类酒醉饭饱后的灵感迸发可以创造九十年代或两千年后的经济奇迹。他多半是崇拜经济学在目前形势下足以扫荡其他一切学问的威势。

九十多年前，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学医，看过一次幻灯片后，决定放弃学业，认为“第一要著”应该是文学，而且真的就干起来了，终生未渝。但他那时候并没有怎样张扬，事后回想起来，还带着一种苦涩的自嘲。现在这样的文学据说已经“过去”了，因为更灵光的东西——经济学——“来了”。

但愿这回来的真是经济学，而不只是“来了”，则文学就算过去，又何足道哉。

（原载《书屋》1999年第4期）

不说“知识分子”



永远不乏这种批评家：善于制造完美的标准，衡量一切，尤其衡量人——别人。见考据家伏处牖下，终日孜孜，就批评道：怎么可以不问世事呢？“为学术而学术”吗？简直“玩智丧志”。（多么可爱，应得发明奖！）这时标准当然是既做学问又参与世事，可你真要学浮士德博士把书房门从后面永远关闭，真要如鲁迅“日战夜战，水战火战”，真要像闻一多“拍案而起”，颠沛，受伤，至于饮弹，批评家于赞美之时，又会摇头以为不值，或者学金圣叹批三国：“谁叫你赤膊？”拿了这样完美的标准，还可以大搞“文人比较学”，以钱钟书比鲁迅，叹息鲁迅学问上的遗憾，指责钱钟书“参与”不够——都不合格，综合起来，就显出惟自己最高明。比较不同处境下的文人，此种高论实在多去了。例如，比较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五十年代以后不同群体的分化或同一个人的变化，于是发现了“人格的秘密”。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自己先装成白痴，好像果真不知道五十年代前后文人生态的不同。最容易的自然还是以细行私德轻

易抹杀一个作家，或以政治上的堕落整个否定其人在哲学文学上的贡献，斥海德格尔为无知妄人，批周作人为没有灵魂，等等。

我由此知道，中国没有完人，盖因这标准太严，而中国少死心塌地的考据家、义无反顾的战士，一半也因为考据家当考据当战士战斗时，过于看重这些既不考据更不战斗的酷评家的宏论了。

不错，这种批评祭起的完美标准，其中就有“知识分子”。我所以嫌恶这个词，虽然明知不过是将对人的嫌恶转移到了无辜的概念上。

中国的有学识者能够从理论和历史角度说明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从近年知识界的日渐成熟，可以明白地看出希望来。中国的真诚无伪的读书人能够以身体力行告诉大家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也不用怀疑；这种读书人以前有，以后还会有。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也绝非空洞的概念，虽然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也许并不喜欢这个好听的名，或回避，或将这名改造成贬义，专指不肖者，自己则于此之外，“建构”个人的语言，这语言和“知识分子”有关，但比任何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都更实际，更富差异性。

这都可举鲁迅为例。中年“呐喊”之前和早年“振臂一呼”之后，他曾长达十年，“沉入于国民中”，但看那时日记，何尝真的混为常人，何尝消除了和大众的距离或今日所谓的“精英情结”。但那样孤高了，他还是不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以后“漂流”中，他始终面对日益壮大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却偏说中国除帮忙、帮闲、扯淡，并无俄国那样的“智识阶级”。这当然不能抹杀他作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也不能抹杀现代中国存在着“智识阶级”的事实，但以知识分子为题谈论鲁迅时，也确乎不能无视他终生对这词执拗的拒绝。

人有权抓住任何迎面而来的概念来表达意向中的事物，这事物可以并不为他实际所有。人生在世，不免议论；凡所议论，却不必事事切己——把说过的全部装个袋子背上，这人老了将成为

富翁，是无疑的，但恐怕未到老时，已经压扁了。人们说话皆应一时一地之景，发完便讫，“知识分子话语”就是，但那下面，须有常备不懈支持这“话语”的“语言”。都在谈陈寅恪，一时产生了围绕陈寅恪的“知识分子话语”，且大致可以互相沟通。但陈的语言世界有几人可以分享？就说鲁迅罢，一生“趋时”，很少回避热点问题；在“话语”层面，他尽量和更多的人交流，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语言的固执——那是更加深邃稳定的个人存在的世界。讨论“知识分子话语建构”，有必要区分大家共享的“话语”和这下面各人自己的“语言”。“知识分子”应该归入叫做知识分子的那群人的“话语”范畴，并非他们的“语言”。对这个词，以及一时从它扩散开去的“话语体系”，不说，不一定比说好；说，也不一定比不说强，关键看“知识分子”云云背后是否真有一定的语言支撑。

但话语世界的常规，是说了不吃亏，不说白不说。沉默，倒总不免假清高，还要引来刹不住而不得不说的质问：难道你不是知识分子吗？诚然，这质问是本质的，但更本质的问题是：是否知识分子，并不在于说或不说“知识分子”，而在于有没有“知识”。“知识”在西语的本意，据可能并无资格算作有些人的“知识分子”的海德格尔考证，是指“在……之中”的“熟悉”，相当于“存在的语言”。工匠对锤子不知评价忘乎所以的使用，就富有“知识”的“分子”，其对锤子和锤的活动的知识论、伦理学或美学之应该与所以然的了解，都包含在里面，这跟说与不说（有没有“工匠话语”）无关。也可以说，锤的时候，工匠一直就那样“说”着，陈寅恪本着自己的心意教养立身行事，就一直在“知识分子”着。

但我偏向于不说，还有另一层理由。知识分子作为普遍概念可以使任何谈论者借以自壮是真的，但同时也可以使任何谈论者显得大言不惭，不自量力。所得所失，堪堪相抵。而且“知识分子”绝对是弱者话题。谈论知识分子了，则他们的处境多半不

妙，谈论也由此变形，或插标卖勺，引人注目，或意在消除自我怀疑，总之，发生了“认同危机”，古人的说法是“妾身未定”。至于谈过之后，也并不总能如愿以偿，事与愿违的可能倒更多，更何况“意谛”一旦“牢结”在某个问题上，会逐渐挖空问题本有的内容，使谈论变成单纯的词语重复，忘了实行，更看不到其他问题，最后只好像祥林嫂，天天爬起来总那套东西，无非证明自己的思想原本不过一团糍糊，“知识”的“分子”，怕很少很少。故最好少说，或不说，——这点小算盘倒乐意贡献给大谈知识分子的专家们参考。

1998年4月12日夜

(原载《作家报》1998年5月7日)